

壮族古方块文字特征分析*

황후남** · 김종호***

目 录

1. 引言
2. 古壮字分析
 - 1) 自造古壮字的历史背景
 - 2) 独体字
 - 3) 合体字
 - 4) 变体字
3. 结论

中文摘要

本文以《古壮字字典》所收录的自造字为核心材料，系统分析古壮字的构形类型与结构逻辑，重点探讨其在语言适配、音义对应与符号重组等方面的机制特征。文章将自造字划分为独体字、合体字与变体字三大类，并进一步辨析合体字中的会意、形声、加形、二形、二声与反切六种构形方式。研究发现，古壮字构形体系在继承汉字“六书”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复合构字策略，展现出对壮语音节结构的深度整合与对汉字构件的再编码能力。特别是在音节拼组、语义强化与形式创新等维度，古壮字体现出高效率的构形原则与符号表达机制。本文尝试建立一套适用于古壮字分析的构形分类体系，为汉字系民族文字的比较研究与构形理论拓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古壮字；自造字；构形机制；汉字系文字；少数民族文字

* 이 논문은 2021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 (NRF-2021S1A5C2A02086852)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중국연구소 몽중월 프로젝트 전임연구원(제1저자)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중국언어문화학부 교수(교신저자)

1. 引言

古壮字是壮族在长期语言实践中创造并一直沿用到1957年¹⁾的一套方块字书写系统，虽广泛借用汉字记录壮语，但亦包含大量壮族自主创制的“自造字”。这些字多数不见于传统汉字文献(如《说文解字》)，体现了壮族对汉字文化输入的创造性回应与文字再造能力。作为具有独立构形逻辑的表意与表音复合系统，古壮字不仅承载了壮语的音义结构，也为民族文字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基础。

《古壮字字典》(2012)共收录古壮字10700余个(含同义异形字)，其中4918个为壮族自造字，是本文分析的核心对象。已有研究如王锋(2003:30-40)从象形、假借、仿造等角度加以分析，覃晓航(2010:47-58)则从借用、形声、双声、会意、反切、象形、截部、填笔、减笔、转音、笔画、融体等多个角度进行分类探讨。然而，学界主要关注古壮字的借用原则与音义对照，对“自造字”的构形机制、结构类型与语音对应关系的系统分析尚显薄弱。

事实上，壮族所创字形不仅体现了对汉字构件的创造性组合，更构建出具有语音依存特征的内部构形系统。其构形逻辑深嵌于壮语音节结构与认知模式之中，反映出非汉语族群在“汉字系文字”架构中的再编码路径。这一现象对于理解“汉文化圈”文字演化机制具有启发意义。

本文以《古壮字字典》为基础，聚焦其中“自造字”部分，从独体字、合体字与变体字三种构形路径入手，分析其结构特征、构形逻辑及语音依存机制，揭示壮语文字系统中所蕴含的构字规律。全文所列示例字形参照《古壮字字典》及王锋(2003)《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之标记方式，以保持表述一致与体例规范。

在方法论上，本文将结合王锋(2003)对古壮字构形类型的界定，参照“表意

1) 1957年以后，壮语有了应用拉丁字母的壮文，1981年，由于壮文的特殊字符在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对壮文打字、印刷造成了妨害，政府又制定了《壮文方案(修订案)》，将特殊字符用一个或两个拉丁字母来表示。这套方案于1982年3月20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这就是现时的壮语文字。参照<https://baike.baidu.com/item/壮语>，2024.12.21.

—表音—附形”三类构形原则，并借鉴“复合构字机制”“音节拼合构形”等构形理论模型，分析构形部件在功能表达上的多样化与结构配置逻辑，建立适用于自造字分析的分类体系与术语模型。

本研究旨在揭示古壮字构字实践中的系统性结构，拓展少数民族文字系统的构形范式分析，并为未来“汉字系”民族文字的类型比较与构形理论建构提供借鉴。

2. 古壮字分析

为具体揭示古壮字自造系统的内部构形规律，本文在总体分类上依据《古壮字字典》所载字例，将自造字区分为三类：独体字、合体字与变体字，并以构形结构作为分类依据，排除借字与同形异义字的讨论。

其中，合体字构成最为复杂、类型最为丰富，内部又可细分为以下六种构形方式：会意字、形声字、加形字、二形字、二声字与反切字。这些构形方式有的强调语义构合(如会意)，有的体现音节组合(如反切)，有的则反映结构符号的再编码(如加形)，展现出古壮字书写系统兼具表意、表音与结构功能性增强的复合特性。

1) 自造古壮字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50万大军进军岭南，于公元前214年统一了岭南地区，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把岭南地区置于中央集权统治之下。稍后又在今广西地区修筑灵渠，把湘江和漓江连接起来，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

据王锋(2003: 06)，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将蒙恬征服百越地区²⁾，汉字也随之传播到岭南包括广西、广东、越南中北部的广大地区。秦始皇

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因此，可以说在南方，百越民族³⁾汉字的传播在秦始皇时便已开始。

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灭亡，驻守南海郡的秦将赵佗攻占桂林、象郡，建立“南越王国”，自称南越武王。南越国时期，在今壮族地区设立学校，进行汉文化教育，壮族先民逐渐掌握了汉语文。此后又有大量避乱的文人和贬谪的官吏来到壮族地区，他们倡导汉文教育，并开坛讲学，进一步促进了汉字和汉文化在壮族地区的传播。汉文的广泛传播及其深远影响，为壮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⁴⁾。

最初壮族人们直接假借汉字书写自己的语言，但是两个语言语音系统的不同，汉字不能全部满足壮族语音，因此对汉字造字原理熟悉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自造新字，这种自造字就是人们所说的“古壮文”、“土俗字”、“方块字”。壮文的正式形成，目前学术界多以唐初永淳元年(682年)⁵⁾刻于上林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为标志⁶⁾。该碑为澄州(辖今上林全境及武鸣、马山、忻城部分地区)壮族大首领韦敬办所刻。碑文⁷⁾虽然文章是用汉文书写的，但其中夹杂了许多汉字的异体字、简体字，以及所谓的“土俗字”，即自造的新字。

东汉时期的许慎是首位系统研究汉字构造的学者，他在《说文解字叙》中

2) “百越”之称谓源于先秦古籍对南方沿海一带古越部族的泛称，又称古越族或越族等，因这些古越部族众多，故谓之为“百越”。百越有很多分支，包括吴越、扬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众多越族支系。

3) 岭南地区的南越、西瓯、骆越演化为今天的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佯族等少数民族。

4) 参考王锋(2003)，《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民族出版社，p.25。

5) 在朝鲜半岛公元7世纪末开始使用了“吏读”。吏读是一种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朝鲜语的一种特殊的文字形式。新罗神文王(681~692年)时期的儒学家薛聪所创。在高丽和朝鲜时期，吏读主要用于公私文书。吏读的特点是实词大致用汉语词，这些词进入句子时一般都按朝鲜语的语序，添加用汉字标记的表示语法意义的类似于汉语的助词成分(朝鲜语称为“ㄷ”), 如石塔五层乙(加宾格助词“을”), 八十以上果(加副词格助词“과”)十岁以下。

6) 此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澄泰乡洋渡村麒麟山石牛洞。全文包括序和四言颂诗二首，五言诗一首，共17行，381字，楷书。

7) 碑文叙述了韦氏家族修建大宅园的缘由，并称颂大宅的坚固，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参照：<https://baike.baidu.com/item/六合坚固大宅颂>。

深入阐述了汉字的造字基本原理，即“六书”。本文研究发现，在遵循造字原理的古壮字体系中，形声字占据主导地位，同时也包含极少量的象形字和指事字。

2) 独体字

《古壮字字典》(2012)收录的独体字有象形字与指事字。

(1) 象形字

古壮字中的象形字通常以事物的形状为基础，用最简洁且富有概括性的笔画勾勒出所代表事物的基本形态。《古壮字字典》(2012)的序文中提出，下列文字被归类为象形字：

表1, 象形字

古壮字		
标音	twɔŋ ⁴	ba ³
壮字义	拐杖	蝴蝶

根据本文的分析，《古壮字字典》收录的一万多个字中，象形字只有两个，即“𠃉”拐杖和“𠃊”蝴蝶。⁸⁾





(2) 指事字

汉字中的象形字最初接近于素描画，以直观的图形描绘事物的外观，是最

8) 覃晓航 (2010 : 98) 亦指出，《古壮字字典》中被归类为象形字的仅有两例，即“𠃉”拐杖和“𠃊”蝴蝶。

早的造字方式之一；而指事字则是一种更抽象的造字方法。当意义无法通过具体形象直接表达时，指事字采用抽象的符号表示，或者在象形字的基础上通过添加或减少笔画或符号来表达所指的概念。《古壮字字典》(2012)序文主张下列文字属于象形字，本文主张下列字属于指事字。

表2, 指事字

古壮字				
标音	dun ¹	naŋ ⁶	am ⁵	um ³
壮字义	站	坐	背	抱

如上表格2，表示“站”、“坐”、“背”以及“抱”确实不像象形字，倒类似于汉字的指事：“3”⁹⁾指“身体”，头顶“物体”表示“站”；身体底下有“垫物”表示“坐”；“身体”后部背“物体”表示“背”；“身体”膝下环抱“物体”表示“抱”。

关于古壮字的象形字和指事字，覃晓航(2010: 98)指出方块壮字的简化¹⁰⁾带来了不少的简体字，但有的简体字过简，反而难以辨识，如“丿”、“一”、“乚”等。为提升这些简化字(包括象形字)的辨识度，人们开始尝试通过添加笔画的方式进行意义提示，从而逐渐发展出具有示意功能的“指事字”。如在“一”的上方加“丨”构成“丄”，表示上面；在“一”的下方也加“丨”，则表示下面。再如在“3”的字形后部加一点，形成“𠄎”，用以表示“人在背东西”。而周有光(1998: 220)指出这些符号跟古壮字(壮语方块字)不属于同一类型，大致是加在古壮字中用的几个记号，因为古壮字是以汉字楷书及其部件作为材料，楷书早已超过象形字时期，因此古壮字不可能有象形字一类。

本文认为周有光的此见解很有道理。其实在朝鲜半岛，新罗时期也有一些

9) 表格2所示的指事字也收录在《布依方块古文字》上，但是标的发音不同。另外，布依方块字还有“𠄎”，表示“弯”和“低”；“𠄎”表示孵化。

10) 覃晓航(2010)，《方块壮字研究》，民族出版社，p.57.主张方块壮字的形体演变历程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独体字阶段、合体字阶段、简化字阶段，以及指事字的产生和象形字的残留。

汉字的创造，例如形声字、会意字和合音字，但很难发现象形字和指事字。值得注意的是新罗时期创造的合音字虽然由两个汉字构成，即，合二字之音为新字之音，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反切字。“石”在朝鲜语有训读 돌 [tol] (训读，固有词) 与音读 석 [sök] (音读，汉字音) 两种读法。由于训读 돌 [tol] 没有对应的音读汉字，新罗时期的造字者在构形时，上部采用音读“石”字 (석 [sök])，下部加上表示终声“ㄷ”的“乙”字，以标示训读末音。这类自造汉字至今仍在韩国使用。以下简要介绍新罗时期创造的若干汉字：

表3，新罗时期自造字

造字方式	形声字	会意字	合音字
自造汉字	媧	畚	芘
构成	从女思声	上水下田	上石下乙
韩语义	婆家	水田	石头 (韩国固有词，一般用于人名)

回顾中国历史，秦王朝统一岭南后推行“书同文”政策，使岭南地区的壮族人开始使用汉字书写和阅读公文。随着时间推移，岭南的壮族先民逐渐接受了汉字。然而，由于汉字无法完全替代壮语的发音，壮族先民依据汉字的《六书》原则创造了大量方块字（即古壮字），以满足本民族语言表达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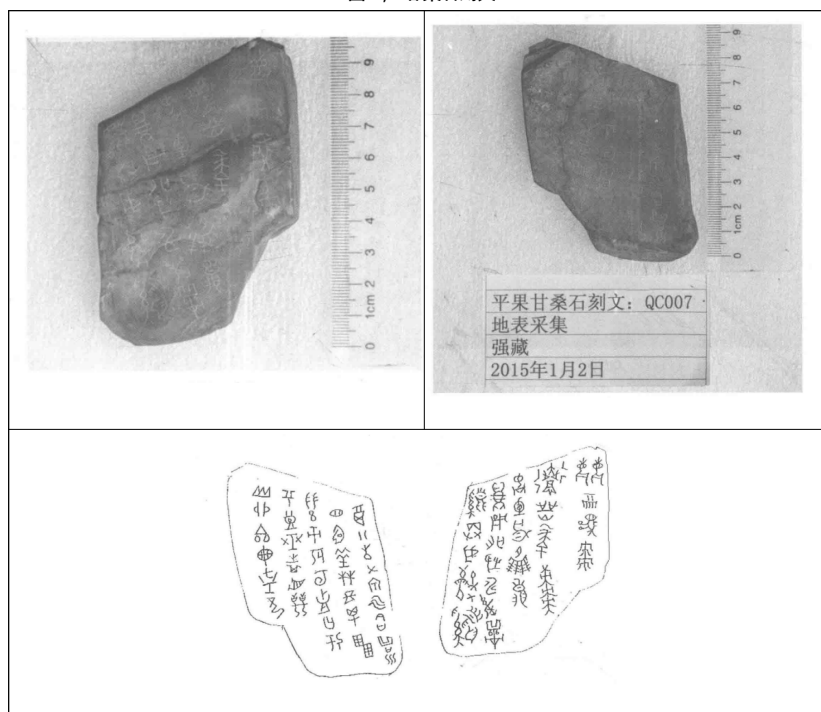
此外，秦始皇时期已开始使用小篆，新创象形字和指事字的情况极为罕见。这两类字作为《六书》中最早的造字方法，主要出现在甲骨文和金文阶段。至秦始皇时期，汉字形态趋于规范化，逐步发展为成熟的表音表意结合的文字系统，其中形声字占据主导地位。小篆是对大篆(如石鼓文)的一种简化和标准化，主要功能在于统一文字形态。因此，小篆虽保留部分象形字的构形方式，但整体上以延续和规范既有字形为主。

总而言之，小篆的主要作用在于简化和标准化，这也表明在该时期，汉字体系已较为成熟。由此推测，壮族先民在自创汉字系文字之前，很可能已拥有自己的原始文字体系，而这一体系或许并非直接源于小篆。

李志强(2018)《苹果甘桑石刻文图像叙事-摹本及字符集》，收录了133片甘

桑石刻文石刻文¹¹⁾共有10365个字符。中央民族大学梁庭望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壮族文字的发展体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刻画文、古壮字（又称“方块文字”或“土俗字”，始于秦始皇统一岭南、汉文化大规模传入后逐渐萌芽）、以及壮文（于1957年11月29日正式制定并推行）。并进一步指出，在古壮字产生并广泛流行之后，刻画文便已无迹可寻，显示刻画文的存在应早于古壮字，可能属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民族文字形态。

图-1, “甘桑石刻文”



11) 根据史先建 (2015) 《少数民族文字新发现——“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出版》，《民族论坛》记载，甘桑石刻文的发现时间是在2006年，但真正引起学界关注是在2013年1月26日至27日于苹果乡召开的“壮族土俗字与甘桑石刻字符研讨会”上。

图1)为李志强 (2018:57 - 58) 所收录的第015号甘桑石刻文及其拓本。据此, 本文认为有理由推测上述的所谓象形字很可能是壮族原始象形文字和指事文字。

3) 合体字

本文所称“合体字”, 是指由两个字符或汉字部件组合而成的自造字, 其构形结构既体现出古壮字系统对汉字构形资源的继承, 也展示了其基于壮语语音与语义系统所作的结构性创新。根据构形动因与功能特征, 合体字可分为六类: 会意字、形声字、加形字、二形字、二声字、反切字。以下依次展开分析。

(1) 会意字

会意字¹²⁾是由两个或多个具有语义关联的构件组合而成, 其构形强调图像性结构与语义的合义叠加机制, 在“形—义”直观联动中形成新的语义单元。这类字虽脱离了原汉字的语音系统, 但在意义上往往部分保留原汉字的基本义项, 并在组合中赋予新的语义指向, 构成典型的语义叠加型构形逻辑。例如:

表4, 会意字

古壮字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结构	上天下上	上天下下	上水下口	左日右云	左月右天
标音	kun ²	la ³	bo ⁵	ŋon ²	du:n ¹
壮字义	上	下	泉	日	月

12) 王锋 (2003: 38) 将此类古壮字称作“意义合体字”。

如上表，古壮字均由两个汉字或其构件构合而成。前三例为上下结构，后两例为左右结构，其组合不仅呈现视觉图像的可读性，也保留一定的语义连贯性。此类构字在现代汉语词典或《辞海》中大多无载，部分字如“杏”¹³⁾或可见于异体字系统，但其组合方式与功能已脱离传统汉字体系，体现出明显的地方性与民族性。

这一构形方式亦存在于汉字系统内部，如“休”（人+木，人在树下休息），“焚”（林+火，火烧树林），“尖”（小+大，上小下大）等，均以语义图像的联想形成合义新字。

另外，古壮字的有些会意字很直观，图式清晰，读者易于解码，如“矮”表示“矮”、“孬”表示“坏”¹⁴⁾。

本类构形方式体现出古壮字在“形—义”关系上的直观表现力，延续了汉字会意构形传统，具备较强的语义透明性，是古壮字系统中最为直观的表意构形手段之一。

(2) 形声字

形声字是在古壮字构形系统中数量较多、结构较成熟的一类，采用一边表示意义、另一边表示读音的构形方式，融合了“义符”和“声符”的双重功能。其中形符多为表意偏旁，承担语义类别指示功能，而声符则为一个可独立成字的汉字。但由于壮语与汉语在语音系统上的差异，声符多仅能表达相近音值，极少完全重合。其构形逻辑基本延续了汉字传统中的形声字规则，但在具体实现上又体现出对壮语本族音节系统的适应与再编码。

根据声符与形符在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古壮字中的形声构形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13) 《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2018:892)明示读音为[mèn]，〈方〉，表示水从地下冒出。用于地名：杏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宾阳)。

14) 参考覃晓航(2010)，《方块壮字研究》，民族出版社，p.66。

A：左形右声

表5，左形右声形声字

古壮字	𣵒	𩺰	𧰨	𧰨	𧰨
国际标音	ʋam ⁴	pja ¹	Tin ¹	wun ²	fun ²
结构	三点水加念	左鱼右巴	足字旁加丁	单人旁加云	左手右逢
状字义	水	鱼	足	人	手
汉语发音	niǎn	bā	chēng	yún	-
汉字义	渰，水无波	鱼名	跣，脚细长，行不正	行走，飘移不停的样子	-

如上表格，这些古壮字均为形声字，左侧为形部，右侧为声部，而且除了第五个字，均可以在汉字系统搜索得到。

B：右形左声

表6，右形左声形声字

古壮字	𣵒	𣵒	𣵒	𣵒	𣵒
国际标音	ʋok ⁸	pit ⁷	pei ¹	pei ¹	la:i ¹
结构	左六右鸟	左必右鸟	左卑右年	左贝右鸟	左来右多
壮字义	鸟	鸭	年	麻雀	多

如上“右形左声”型古壮字在汉字系统均搜索不到。

C：上形下声

表7，上形下声形声字

古壮字	𣵒	𣵒	𣵒	𣵒	𣵒
国际标音	pja ¹	don ¹	pjak ⁷	ʋa:n ²	bun ¹
结构	上山下巴	上山下东	草字头加北	宝字盖加兰	上天下云

壮字义	山	树林	菜	家	天
汉语发音	bā	dōng	bèi	-	-
汉字义	独, 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	森林, 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	野薤, 野蒜头	-	-

如上表格, 这些古壮字均为形声字, 上部为形部, 下部为声部, 而且前三个字均可以在汉字系统搜索得到。

D: 下形上声

表8, 下形上声形声字

古壮字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国际标音	na ²	vei ⁶	ta:i ¹	jou ⁵	hun ³
结构	上那下田	上利下土	上台下死	上又下止	上引下上
壮字义	田	地	死	在	上

如上的古壮字在汉字系统里均搜索不到。值得注意的是壮语表示“水田”的“𠵼”是形声字; 在新罗时期表示“水田”的自造字是会意字“畚”。

E: 外形内声

表9, 外形形声字

古壮字	𠵼	𠵼	𠵼	𠵼	𠵼
结构	外门内象	外门内曾	外门里斗	外口里鳶	外口里算
国际标音	Yuk ⁸	kjaŋ ¹	tou ¹	lu:n ²	θu:n ¹
壮字义	闺房	矣禁	门	圆形	园子

如上, 形声字融合音符与义符, 构形逻辑近似于汉字传统形声字, 但其声符选择更贴近壮语本族音节系统, 是典型的“汉字结构-壮语音值”对接产物。

此外, 不少自造古壮字并未严格遵循汉字“六书”原理, 而是通过构形方向

调整、结构部件增减等方式构建新字，展现出较强的语言适配与结构创造能力。特别是在“加形字、二形字、二声字、反切字”等类型中，这种超越“六书”的创造逻辑更加明显，体现了古壮字系统在与汉字接触过程中的结构性变革与符号再造能力。

(3) 加形字

“加形字”是古壮字构形系统中一种具有结构附加性与语义延展功能的构字方式，其特点是在既有基本字形上附加新的构件，以实现语音保留、义项区分功能。此类构形既不同于传统“形声”或“会意”字的构字逻辑，也不属于变体字系统中的“笔画增删”，而更接近于一种“附形造字”或“加附构形”，体现出古壮字系统在构形机制上的灵活性与功能性取向。

王锋(2003:36)指出，南方汉字系文字中的“加形字”¹⁵⁾受到汉字中“口”部首构字的启发，壮族书写者在使用汉字记录本民族语言时，逐步发展出在字形基础上加附构件以强化语用功能的造字方式。

表10, 加形字

古壮字	𠵼	𠵾	𠵿	𠶀	𠶁
结构	左口右布	左口右度	左口右九	左口右北	左口右皮
国际标音	bo ⁵	tu ⁶	kau ¹	pak ⁶	θei ²
壮字义	泉	够	我	累	时
汉语发音	bù	duó	qiú	-	-
汉字义	广西地名 用字	表示语言 无度	高气也 ¹⁶⁾	-	-

如上表所示，这些字多在原有结构基础上加上“口”字偏旁，形成加形强化

15) 王锋(2003), 《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 民族出版社, p.36页提出, 南方汉字系文字中的加形字是受到汉字“口”旁字影响而发展起来的。

16) 《说文解字》标明, 语义为“高气也”。

结构。其中前三个字（泉、够、我）在现代汉字系统中可检索到对应字形，但其读音与义项已发生壮语本族化变化。后两者则为壮族自造字，无法在汉字系统中直接对应。

这一构形方式反映了古壮字系统在“结构最小改动—功能最大区分”原则下的高效性与创造性，是在对汉字资源有限继承条件下发展出的具有自主创新意义的构字逻辑。

(4) 二形字

“二形字”¹⁷⁾是古壮字自造系统中一种具有独特构字逻辑的类型，其构形特征在于：以两个构件并列组合成一个新字，二者在语义上均具有功能性，但彼此之间不呈主从关系，整体读音通常取自其中一个构件，构形上呈现出显著的音义复合性。

与传统汉字中的会意字相比，二形字在语义关系上更加严密。会意字的构件之间可能存在较大语义差异或仅构成联想关系，而二形字中的两个构件必须语义相同或相近，且整体义项几乎为其构件义的重合或并列构成。这种构形方式不仅强化语义显现力，也体现出对音节构成的抽象能力。

表11, 二形字

古壮字	𠵹	𠵹	𠵹	𠵹 ¹⁸⁾	𠵹
国际标音	rau ³	ro:ŋ ⁶	ta:i ²	fu ²	tho:m ¹
壮字义	头	亮	代	泥土	团聚

如上所示，诸如“头、首”“光、亮”“泥、土”等由两个意义相近构件组合而成的“二形字”，其整体义项高度贴近部件原义，构成语义重合度极高的合义结构；

17) 王锋(2003:38)指出，“二形字”是由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形符构成，其整体字义亦与两形符所表达的意义一致或接近，读音通常取自其中一形符。

18) 汉字系统可以搜索到此字，标音为ní，表示“含水的土”。

而如“世代”“团、聚”等构字，则体现出构件间的语义连贯与义项衔接，整合生成语义延展性更强的新字。

此类并列式构形不仅延续了汉字构字的形式传统，更体现出壮族在书写实践中对本民族语言音节结构与语义系统的深刻把握。这类构形在结构上实现形式对等，在功能上完成音义融合与语义强化的统一，构成古壮字系统中典型的“构形本土化—音值再编码”现象，彰显出其“表意—表音”兼具的系统特征。

(5) 二声字

“二声字”¹⁹⁾是古壮字系统中一种以语音为主导的特殊构形方式，其显著特征是：整个字形由两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声符并列构成，而整体读音亦与部件音值保持一致或高度接近。这类字的构形本质在于以音导形、形从于音，其主要功能不是传达语义，而是用于标注壮语的音节结构，实质上是将汉字构件作为音节拼组的表音符号使用。

“二声字”的出现，标志着古壮字系统中部分构形机制已从“形—义”模式跃迁至“形—音”模式，其构形理念由语义承载转向语音表征。这种方式虽非音素文字意义上的拼音系统，却在保留汉字方块形制的前提下，实现了对壮语音节的结构化表达，体现出本民族文字系统对有限汉字资源的高度功能转化能力。

表13, 二声字

古壮字	𠵹	𠵹	𠵹	𠵹	𠵹
结构	左房右方	左桑右上	左苛右九	左登右丁	左山右三
标音	fa:ŋ ²	sa:ŋ ¹	kau ³	teŋ ¹	sa:n ¹
壮字义	鬼	高	看	打中	白米

这些二声字在现代汉字系统中大多无法检索，显示其构形已完全脱离原始

19) 王锋 (2003:38) 指出，所谓“二声字”，即“由两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声符构成，全字的读音也与这两个声符相同或相近”。

汉字语料体系，专为壮语语音系统服务。它们通过声符并列、音值强化实现音节单位的可视化表达，是古壮字系统中“表音性强化机制”的集中体现。这种构形方式不仅简洁高效、形式规范，也具有极强的功能导向性与识别度，反映出古壮字在“拼音化认知”背景下对汉字形体资源的深度重构与适应性使用。

(6) 反切字

传统汉字中的“反切”是一种源于汉语音韵学体系的语音注音法，其基本原理为“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及声调”，用于标示汉字读音。典型如“东：德红切”，此类反切的基础在于汉语音系内部的音素组合规则，本质上属于音训体系中的语音标注方式，而非构字机制本身。

相较之下，古壮字系统中的“反切字”²⁰⁾与传统反切注音法在功能与构形理念上存在根本差异：其一，古壮字的“反切字”并非用于标注既有字音，而是直接作为表达壮语词汇音义整体的自造字，具有独立的字位功能；其二，其构形机制建立在壮语自身音节结构基础上，通常依照“前字取声起部分、后字取韵尾部分”的组合原则，从既有构件中拼合而成，形成近似“语内反切”的构形模式。

因此，古壮字中的“反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注音法”，而是一种音节拼合型的表音构形机制。它通过部件的音值重组，实现对音节单位的可视化表达，体现出古壮字系统在“形—音”结构方向上的构形自主性与功能适应性。

表14, 反切字

古壮字	笑 ²¹⁾	𠵹	𠵹
读音	rat ⁷	Yut ⁷	cei ⁶
壮义	蘑菇	萎缩	修理
第一音	竹: rak ⁷	“𠵹”是“知”的省略: Yo ⁴	制: ei ⁶
第二音	矢: 0at ⁷	卒: 0ut ⁷	二: ɲei ⁶

20) 王锋(2003:39)指出，反切字是由两个汉字组成，全字的读音由两个汉字相拼而成，前一字取声母，后一字取韵母，其拼合方式类似汉语音韵学中的反切法，因而称为反切字。

这三组例字均体现出“前部标声起、后部补韵尾”的拼合逻辑，其整体读音近似于音节拼音，但以汉字或汉字构件作为拼读基础，形成独立可用的壮字。

反切字的构形方式表明，古壮字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已建立起一套以本族音节结构为核心的构形模型。这一模型吸收了汉字部件结构作为视觉符号资源，同时通过壮语音系规则主导构形，实现了“拼音逻辑-字块结构”之间的系统嫁接。

反切字的出现不仅是表音功能的强化，更是对构形机制本土化的深度体现，是古壮字中最接近“拼音式方块字”的符号形式。它拓展了方块字构形的可能性，突显了壮语在接触汉字后的音系吸收与再编码能力。

4) 变体字分析

本文所指的变体字，是在原有汉字的基础上通过增减笔画而形成的新字。包括省略字和增减笔画字。

(1) 省略字

省略字²²⁾并非直接借用完整汉字，而是抽取原有汉字中的部分构件作为构字单位。所省略的并非笔画细节，而是整体结构中的一个功能性部件，即所谓“汉字之半”。这类“半字”通常作为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使用，其所承载的意义亦与原汉字保持密切联系，体现出构件层级的语义继承性与构形上的高度简化倾向。

21) 汉字系统收录了此字，读音 shǐ，是矢字的异体字。

22) 覃晓航(2010)，《方块壮字研究》，民族出版社，p.56.解释道：“截取某一个汉字中的某一部分（有时候进行简加工）”，并将此类构件称为“截部”。

表15, 省略字

古壮字	艮	丸	尸
读音	ŋan ²	θok ⁷	ʔbu:ŋ ³
壮字义	银子	熟	一半
解释	从“银”省	从“熟”省	从“门”省

但是在现代汉语,“艮gèn”表示八卦之一;“丸”表示“球形的小东西”;而“尸”这个字在汉语中并不存在。

(2) 增减笔画字

增减笔画字是指在原有汉字的基础上增减笔画,或改变汉字的形体,使之区别于原有汉字。可造成的新字就是汉字变体字。如:

表16, 变体字

古壮字	𠂇	𠂇	冇	𠂇	𠂇
结构	“眉” ²³⁾ 减笔	“东”减掉“丿”	“有”减两笔	“人”的“丶”上增两点	“丩”旁上方增笔
国际标音	di ²	lanŋ ¹	bou ⁵	san ²	na:u ⁵
壮字义	无, 不	后面	没有	发抖	助词, 表否定意义

覃晓航(2010:57)提出,将“通过减少某个汉字的笔画以表达某个壮语词的意义”称为“减笔”;而在某个汉字形体上增添部分笔画以构成新汉字,则称为“添笔”。如上表所示,古壮字的前三个属于减笔变体字,而后两个则属于添笔变体字。

本章围绕古壮字中的“自造字”系统展开,依据构形类型,分别分析了独体结构的抽象性表达、合体构字的组合规律以及变体形式的创造特征,呈现出壮族在应对语音差异、书写需求与语义区辨等方面所采取的具体策略。

23) 古壮文“眉”为借音字,标音为“mi³”,表示“有”的意思。

这一体系在吸收汉字“六书”构形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壮语的语音结构与语义表达需求，发展出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构字路径与分类机制。自极简化的独体构形，到部件并列与组合强化的合体方式，再到基于字形变构的符号再造，无不体现出壮族书写传统对汉字构形逻辑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转化。

3. 结论

本文围绕中国壮族的古文字，即汉字系文字中的自造字系统，展开了系统分析。汉字在壮族地区的传播始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期，最初壮族先民主要通过假借汉字来书写本民族语言。然而，受制于汉语与壮语在音系结构上的差异，传统汉字难以全面满足壮语的表达需求。为此，部分熟悉汉字构形规则的知识分子开始创造适用于本民族语言的新字，这些字即被称为“古壮文”、“土俗字”或“方块字”。

古壮字的正式形成，学界普遍以唐初永淳元年(682年)刻于上林的《六合坚固大宅颂》碑为标志。《古壮字字典》(2012)共收录古壮文字10700余个(含同义异形字)，其中4918字为壮族自造文字，构成本文构形分析的核心语料基础。

研究表明，古壮字的构形发展是在继承汉字“六书”原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本土化转化与创造性扩展的产物，同时深度嵌入了壮语音节结构与语义系统。自造字可分为独体字、合体字与变体字三类，其中独体字数量极少，象形与指事构形仅存“拐杖”、“蝴蝶”、“站”、“坐”、“背”、“抱”等个别实例，反映出原始民族符号遗存与后期汉字书写体系融合的双重痕迹。

合体字则种类繁多，包括会意、形声、加形、二形、二声与反切六种类型，分别体现出语义组合、音节拼合与结构符号再编码等多种构形逻辑。变体字则通过省略或增减笔画的方式，在构件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了语义差异化表达与构形系统的灵活再造。

综上所述，古壮字自造字体系不仅在形式上延续并改造了汉字资源，更在

功能上回应了壮语的音义表达需求，构建出一套具有本族语言特征的构形机制。这一机制体现出高度的结构整合性与符号创新能力，是语言接触背景下少数民族自主文字实践的重要成果，也为理解汉字系文字的边缘扩展路径与多元构形逻辑提供了启发性案例。

参考文献

-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古壮字字典》,广西民族出版社,2012年。
- 戴庆厦·成燕燕·傅爱兰·何俊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
- 蓝盛·李锦芳,〈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方块壮字的“汉字化”〉,《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
- 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中央民族图书馆民族出版社,2002年。
- 李志强,《苹果甘桑石刻文图像叙事—摹本及字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1950])年版。
- 罗常培·傅懋绩,《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中华书局出版,1954年。
- 史先建,〈少数民族文字新发现—“甘桑石刻文摹片及字符集”出版〉,《民族论坛》,2015年。
- 覃家道·王定才,《布依方块古文字》,民族出版社,2020年。
- 覃晓航,《方块壮字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
- [东汉]许慎原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画社出版,1997年。
- 王锋,《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民族出版社,2003年。
- 韦达,《壮语文化论》,广西民族出版社,2006年。
-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语文出版社,1998年。
- 周国炎主编,《布依族古籍文献》,贵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
- <https://baike.baidu.com/item/壯語>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Zhuang Square Script

Hwang Hoonam · Kim, Jong Ho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elf-created characters recorded in the Dictionary of Ancient Zhuang Characters, offering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ir structural types and formation logic. The research categorizes these characters into three main types: monograms (independent single-component characters), compound characters (composed of two or more elements), and variant characters (formed through structural alterations). Further classification of compound characters reveals six subtypes: ideogrammatic compounds, phono-semantic compounds, affixal additions, dual-form constructions, dual-sound formations, and fanqie-type combinat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Zhuang script, while drawing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iushu (six principles of character formation), developed its own localized and compound character-building strategies. These strategies demonstrate deep integration with Zhuang phonological structures and innovative recomb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omponents. Notably, the system exhibits high efficiency in phonetic assembly, semantic reinforcement, and visual-symbolic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typolog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se ancient Zhuang characters and contributes to broade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inographic scripts and the theoretical expansion of logographic writing systems.

Keywords: Ancient Zhuang characters; self-created characters; character formation mechanism; sinographic script; minority writing systems

투 고 일 : 2025. 7. 10. / 심 사 일 : 2025. 7. 15.~ 2025.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5. 8. 20.